

# 总体主义背景下的时尚\*

## ——“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着装时尚分析

■ 孙沛东

[内容提要]西方学界主要从社会、市场和文化三个维度,阐释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产生和传播机制,本研究引入国家新变量,从民众的日常着装入手,着重探讨“文革”期间广东民众着装时尚的类型,总体性社会中国家及其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个体着装时尚的影响,以及非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产生与传播机制。研究发现:国家在时尚建构中的作用显著,它型塑了合法性时尚,并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一整套政治化的日常着装秩序。它遵从权力和资源的垄断逻辑,力图借助特殊的着装制度将普通民众的思想彻底革命化,其产生和传播的背景是列宁式政党、军队和国家政权。总体主义的社会控制系统、密不透风的国家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三者共同造就了“文革”着装时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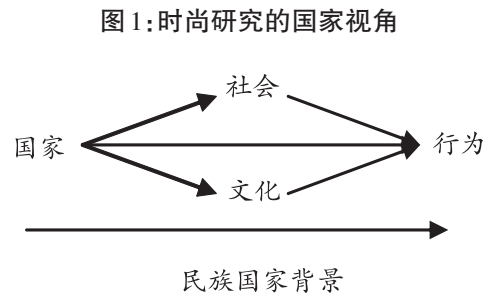
[关键词]时尚 国家 “文革” 广东

### 一、问题的提出

西方“阶级分野论”从宏观层面强调社会因素对时尚消费的影响,把时尚放在阶级分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强调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对时尚文化和消费的影响。<sup>①</sup>齐美尔(Simmel)提出时尚为大多数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个性化的下层提供了一种补偿机制。<sup>②</sup>“身份认同论”<sup>③</sup>和“文化生产论”从微观层面,突出了文化对时尚生产和传播的影响力,前者把时尚视为消费者通过符号的操纵进行自我表达和自我创造的手段和工具,忽视了外部环境对消费者行为的约束;后者关注作为建构身份认同基础的时尚商品的使用价值和符号价值如何被生产商和文化中介人生产并传达给消费者;<sup>④</sup>“集体选择论”从市场的维度,对时尚生产进行分析,凸显了资本和市场对时尚消费和文化的决定性作用。<sup>⑤</sup>上述研究可归纳为社会、市场和文化三者与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中看不到国家的位置。

事实上,上述研究结论源于西方社会,形成于市场机制主导经济活动的宏观背景之下,属于市场化条件下的时尚理论,国家对时尚的作用不显著,它对实行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时尚消费文化很有解释力。而“1949年以后,我国在应对近代以来总体性危机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高度合一的总体性社会。”<sup>⑥</sup>一方面,国家实行资源垄断制度;另一方面,城市实行单位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这些特殊的制度安排使个体完全依附于国家。总体主义国家具有其他类型国家所无可匹敌的作用,它的影响又无处不在地渗透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之中,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总体性社会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而形成。

事实上,总体主义国家的渗透与干涉在“文革”时期达到巅峰,因此,将国家这个重要变量引入时尚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见图1)。<sup>⑦</sup>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试图分析总体主义背景下非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运作机制。



本文所用“国家”一词,<sup>⑧</sup>意指作为制度安排主体的国家,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总体性社会中,国家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核心领导层的行动。<sup>⑨</sup>因此,这些领导人区别于一般行动者,可以被视为“宏观行动者”,他们能够通过发布命令(这种命令可以是政府的“决定”、“通知”、“报告”,领导人的“讲话”,甚至是领袖诗词),自上而下地进行制度安排,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掌控。因此,时尚研究的国家视角包含两种:一是国家领导层,尤其是核心领导人在重大政治场合的着装行动;二是国家政权合法性所赖以存在的阶级的日常着装行动(主要指军人、工人和干部三大阶层,农民着装的示范效应不强)。

### 二、研究方法资料来源

本文的实证研究旨在理解和阐释“文革”期间个体如何着装,个体着装行为背后客观的社会情境以及个体对社会情境的主观认知。

#### (一)访谈资料

访谈于2005年3月~2006年10月集中进行。本文属质性研究,以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为主,主要对广东户籍民众进行访谈,根据“生活史个案研究”<sup>⑩</sup>和“出生同期群理

论”,<sup>①</sup>选取了“文革”期间在广东工作或学习的65位广东城市居民作为访谈对象(仅有一位受访者在1966年~1967年两次赴非洲工作)。受访者以出生于1930年~1950年为主,其中男性33位,女性32位。受访者分布在广东省辖区内21个地级市中的15个。为保证理论的饱和度,研究者在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教育、职业、地域等方面进行了区分。每宗案例的访谈时间一般每次持续1~2小时。通常每位访谈对象接受访问1~2次。

在访谈中,笔者请被访者追述“文革”期间的生活经历,自己和周围人的日常着装,以及对当时着装时尚的印象和相关故事。此外,笔者还请他们追忆人生重大时刻和重要场合的着装,并与自己的日常着装进行对比评述。

## (二)文献资料

本文所使用的文献资料,第一类是由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类是地方志和报刊上关于“文革”的史料。

## 三、总体主义背景下的时尚

本研究中“时尚”的含义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个体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二是一种集体的、特别的、适合当时品味的着装。<sup>②</sup>通过访谈和相关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文革”时期广东曾经出现过的独特的着装时尚,其颜色主要是绿、灰、黑和蓝四色;款式<sup>③</sup>主要有军装、“中山装”、“工人装”、“列宁装”和“红卫装”五种;<sup>④</sup>军人、干部和工人的着装是主流时尚。

### (一)军装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开始在中国大陆一些大中城市流行,《人民日报》刊发的一条消息可以证实:1949年10月25日,京津卫戍司令部严令市民等不要穿军服。<sup>⑤</sup>同年11月24日,该报再次强调“非军人不得穿军服”,军方对人民解放



1966年一身戎装的领导人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图片来源:中华网)

军现役军人、转业军人的军装和各非军事机关及团体或学校的制服色彩和款式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并由专门的纠察队负责纠正和整饬军风、军纪和军容。<sup>⑥</sup>由此可见,军装的流行肇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军装在广东的流行主要集中在1966年末至1969年这三年。主要着装人群是大中专院校的红卫兵、工人造反派和机关造反派(退

役军人及部分城市居民和极少数有条件获得军装的农民也是其拥趸),尤其是他们中的年轻人,对军装特别热衷,得到一件真正的军装是很多人的时尚梦想。根据1966年底和1967年广东民众的影像资料来看,绿军装已经成为政治游行、政治批判和政治宣传等政治舞台上的革命道具。20世纪60年代“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运动也是军装热的一个重要背景。<sup>⑦</sup>总的来说,军装成为民众的着装时尚,原因有三个:

第一,国家主要领导人在重大政治场合穿一身戎装起到示范作用。

“文革”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接见红卫兵时都选择了穿军装。<sup>⑧</sup>影响力最大的当属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这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以“军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sup>⑨</sup>接见过程中,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主席俨然成为红卫兵的“司令”和“统帅”。当时的《解放军报》对这一场景进行了这样的现场描写:“一位身穿军装,臂戴袖章,肩挎语录包的红卫兵正在指挥广场上的解放军战士和同样装束的红卫兵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sup>⑩</sup>

此外,2006年中华网的“老照片图库”发布了“毛泽东在1966~1976全记录”,其中包括了十年间毛泽东的191张公开照片。除了1966年7月16日在武汉畅游长江时身着浴袍外,毛主席十年来在公开场合只穿过军装和“中山装”两种衣服。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的着装具有一定的政治含义,在“永远突出政治”<sup>⑪</sup>的“文革”时期尤其如此。

从媒体的角色来看,以三大党报为首的宣教机器对毛泽东着军装的彰显与弘扬显示出具有层层推进效应的政治意图。一方面,军装与毛主席语录所倡导的“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一脉相承,它再次强化并放大毛泽东诗词所赞扬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毛泽东本身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八次检阅,鼓动了“红五类”的狂热情绪。领导人的这些政治行为与革命群众的狂热追随,无疑构成一种政治隐喻:军装被认为是最可靠的革命派服装;唯有军人最可信任,他们是经得起革命考验的工农兵子弟。上至领袖,下至民众,从统帅到士兵,革命的精神通过一身戎装鲜明地呈现出来。正是在这种情境下,军装具备了普通民众表达政治认同的功能。在访谈过程中,很多受访者也证实了这一点:

毛泽东主席出来接见文化革命大军的时候,也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那时候全国人民都要向他学习,他接见时都是穿着一套那种军装出来的,一样是戴帽子



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代表宋彬彬为毛泽东戴上红袖章(图片来源:百度网)



的。在全国人的心目中都是崇拜他,效法他的,所以才会掀起了这样的潮流,红卫兵都是穿那些的,就是向他看齐的。这些算是当时的流行时装。<sup>②</sup>

第二,准军事化的社会组织制度是军装成为时尚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社会政治被描述为“中国政治的军事化”,当时的社会具有强烈的军队化色彩,军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声望体系中层于上层。<sup>③</sup>同时,国家推行一种“泛部队化的制度安排”,城市的单位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均按照类似于部队的方式组织起来,国家对民众拥有一种“命令性权力”。<sup>④</sup>当时国家实现社会组织、动员和控制的基础是一整套准军事化的组织制度,一方面,在这种政治的军事化框架内,普通民众内心深处容易产生崇军思想,军人以及军装自然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着装实践的标本和典范。

能穿军装的人一般是“红五类”,穿起来就觉得比较威水(粤语,意即“光荣”、“威风”)!意味着政治的自豪感,没错,是政治的自豪感!军衫是“崇拜衫”,“明星衫”,很少人能够穿到。那时候你要能搞到一套绿军装,本身是一种荣誉来的啦,而且大家看到你有一套绿色军装就证明你是很革命的,而且你是有一定的背景的。基本上都是一种权力,一种荣誉,安全感不在话下,而且很多人会羡慕你,拥护你。<sup>⑤</sup>

另一方面,在政治混乱和法治欠缺的“文革”时期,两百万“支左”军代表拥有的权力不容小觑,普通军人人数很多,一般民众对他们难免心存畏惧,因此,军装对普通民众而言,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政治保护伞”。

穿上军装,人也好像“大嚟嘅”(粤语,意即“厉害”或“了不起”),有权势点,有强者撑腰,有军队撑腰嘛,你出去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矛盾,穿着军装,就是军人,即使不是炫耀,都当你是军人!是军人,你就不要小看他,好厉害的!起码对方不敢有什么举动,声音也要降低八度呢!<sup>⑥</sup>

第三,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诗词对民众日常着装选择具有一种命令性的权力。毛泽东于1961年所作的《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对军装这股风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军装迅速被推到时尚的最前沿。

已有学者从制度层面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消费制度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多从政府的“决定”、“通知”、“报告”着手,<sup>⑦</sup>在此基础上,笔者发现对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诗词、题词,甚至个人书信(比如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和江青等的书信)的研究,应该是上述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同时,陈寅恪倡导“以诗证史”,意即诗歌可以作为重要的史证加以采信。“文革”之初,毛泽东赋诗为“文革”定调,<sup>⑧</sup>“文革”中后期,毛泽东又利用诗词将斗争

的矛头指向周恩来。<sup>⑨</sup>以毛泽东《为女民兵题照》这首七绝为例,一身戎装的女民兵形象包含诸多政治内涵:它彰显了时代的审美与国家的需求;表明普通民众在内心深处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体现了他们时刻准备与阶级敌人决一死战的英雄气魄;它符合国家倡导的“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顺应国家所提倡的具有丰富道德价值的劳动美学。<sup>⑩</sup>

“文革”初期,普通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顶点。领袖一度被神化,对他个人的顶礼膜拜与模仿造就了准宗教化的领袖哲学。《为女民兵题照》一诗对当时女性着装造成明显的影响,女性纷纷抛弃以往的花布衣衫,换上草绿色的军装或“仿军装”作为自己的日常装束,当时的说法是:“像章戴胸前,革命精神抖,一身绿军装,军帽必须有。”

自小受的教育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语录》是红宝书。我们的思想和言行举止都是特别崇拜党,崇拜毛泽东,崇拜解放军,所以穿上“红卫装”是希望被毛主席接见,穿上军装是向解放军靠拢。主席诗词都说过嘛,我们自然要“不爱红装爱武装”了!<sup>⑪</sup>

而以“林彪事件”为转折点,20世纪7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抵制进入了一个突变阶段。”<sup>⑫</sup>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部分红卫兵群体的过激行为也激起了普通民众的反感。“林彪事件”在“文革”着装时尚历史中无疑是一个界标,这之后,人们对军装的崇拜逐渐降温。

## (二)“中山装”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中山装”、“毛装”<sup>⑬</sup>与“列宁装”为代表的领袖装风靡一时。根据《广州市志》记载:

“中山装”由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亲自设计倡导,是一种结合我国民俗特点及中西服装长处的简便服装,以广东便服为基本样式,把直领改为反领,使上衣具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穿起来显得笔挺,同时将便服或西装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还加上袋盖,各钉纽扣一粒,既美观又安全。原设计上衣纽扣是七个扣子,后为方便改为五个,这就成了小翻领、四袋、五扣的上衣。裤子是参照西裤式样,前面开缝,一律用暗扣,左右侧各置一大暗袋,裤头右前部设一小暗袋,俗称“表袋”,穿着方便。此外,裤袋腰部打褶,裤管翻脚,也有异于其他服装。<sup>⑭</sup>



身着“中山装”的孙中山(图片来源:华龙网)

“中山装”从创制起就被赋予深厚的政治内涵,衣服外的四个口袋代表“四维”(礼、义、廉、耻),前襟的五粒纽扣和五个口袋(一个在内侧)分别代表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说(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在领口[纽扣]和内侧[口袋],以彰显监察权的人民监督作用);左右袖口的三个纽扣则分别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和共和的理念(平等、自由、博爱),衣领为翻领封闭式,表示严谨的治国理念;背部不缝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sup>⑤</sup>

20世纪20年代“中山装”开始在广东的青年革命者中流行,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进,“中山装”成为一种在小城镇都可见的普通着装。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北方民众也慢慢熟悉了这种服装。<sup>⑥</sup>国共“重庆谈判”期间,从两党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合照来看,当时他们都选择“中山装”作为这个重大政治场合的着装,以显示对孙中山政治理念和遗产的传承与光大。在开国典礼上,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身穿改良版“中山装”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引人瞩目。其后,西方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或“毛装”。它是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即开大领口,翻领也由小变大。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从老解放区来的共产党干部穿灰色“中山装”进入全国各大城市,灰制服成为革命干部的代名词,灰色的“中山装”成为革命的标志和符号,成为人们竞相效仿的最新着装时尚。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右上口袋插上一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象征。受革命的感召和出于对共产党干部的崇敬,一些青年学生追捧它,人们还相应设计出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当时广东的“中山装”主要分为四类:正式的“中山装”、“军干装”、“同志装”(即“翻领文装”)和“企领民装”(又称“企领文装”)。

### 1. 正式的“中山装”

因为敬仰毛泽东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有工人被访者业余时间穿“中山装”,并且认为自己这样的穿着在当时很时尚。

我们老百姓非常敬仰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着装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嘛。军队领导穿绿军装,国家领导穿“中山装”,当时来说是这样的。我们就要学国家领导人的穿着,所以当时大部分人都是穿着“中山装”,无论是机关干部或老百姓都是穿“中山装”。<sup>⑦</sup>

### 2. “军干装”

“军干装”又叫“干部服”、“干装”或“军干服”。<sup>⑧</sup>由正式的“中山装”改制而来,被称作“干部服”、“干装”;由正式的军装改制而成的就是“军干服”。一般有草绿色、蓝色或者灰色。早期正式的“中山装”有四个“荷包袋”:衣袋的形状貌似荷包,是后来缝上去的。“文革”中后期,民众对其加以改良,出现了军装型的“中山装”。衣袋的数目没有增

减,但形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明贴袋变成了暗袋,又叫“开袋”,袋子上加置了袋掩。

“军干服”即干部型的军装,或称为“军便装”,是“文革”中最为流行的男装之一。其造型与“中山装”很接近,区别在于:“中山装”是明贴袋,“军干装”是暗袋;前者造型方正,后者则大幅收腰,便于系皮带(武装带)。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广东城市居民,尤其是一些干部或知青大多穿蓝色和灰色的“军干装”。有被访者认为下乡知青请人缝制“军干服”的行为是寻求保护,追求安全感。

当时我们在农场工作的时候,一般来说,是没有工作服的,都是穿自己的衣服。工作的时候都是穿一些破衣服,缝补的衣服。放工(下班)以后就穿一些好一点的,不等于是款式新,或者衣服是新的,只不过尽可能穿一些没有缝补的衣服。有些人走去布店,买一些接近军装的布料,自己去裁制军装,实际上叫做军干服。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军装应该说代表有组织,有派性,不受别人欺负的,就这样简单。<sup>⑨</sup>

### 3. “同志装”

近似于正式的“中山装”,又叫“翻领文装”,一般以蓝色为主,主要的着装人群是城市里的干部和少数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平民,如医生等。少数工人也以此作为休闲服,主要是工余时间穿,有些工人结婚时也会选择穿崭新的“同志装”。一些家庭经济条件好的知青在农村也穿这种衣服。

插队那时候也不都是穿那些军装的,也会穿那些“翻领文装”,“斜布”那些,“斜布”占多数。在市面上是比较普遍的,多数都是买那些“的斜”(一种含混纺成分的棉布),年轻一点的就穿蓝“的斜”,老年一点的就穿黑“的斜”。<sup>⑩</sup>

“同志装”男女有别,男性“同志装”多以竖领为主,也有小反领的,只有一排纽扣;女性“同志装”以翻领为主,但是不同于西装的那种大翻领,有两排纽扣。“同志装”有的有三个口袋,有的有四个口袋。布料以蓝色的卡其布为主,没有条件购买卡其布,就用一般蓝布。有受访者谈及“同志装”这个名称的来历及缘由:

“同志装”跟我们现在说的“中山装”差不多。当时人们很少称“先生”,见面的时候都会叫“某某同志”,比如说“陈同志”、“李同志”等。为什么大家统称别人“同志”呢?因为当时的人都有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分,“同志”是自己人,如果是反革命,别人就不能叫他“同志”。但是,许多人为了适应当时的情况,认为自己都属于“同志”的队伍。到底每个人是不是都是“同志”呢?就要看情况来定,很难说,他们没有在额上写着自己是不是“同志”。但是,穿上“同志装”,至少上街没人敢随便欺负,自己人嘛!<sup>⑪</sup>



#### 4. “企领民装”

又称“企领文装”，“企领”的意思是“立领”，“高领”或者“直领”，是男式“中山装”的一种领子。“企领文装”上衣在南洋华侨中甚为流行，直领子，有三个衣袋。广东人把有三只明袋的上衣统称为“民装”、“民主装”或“文装”，以区别于军装，因为后者的衣袋是暗袋。“企领文装”是由“军干装”渐渐发展而来的，“文革”前，很多广东人，尤其是干部都穿“中山装”。后来，“军干装”稍加改变样式，进化为“青年装”、“文装”，或者称为“直领文装”，颜色多为蓝色和灰色，以艳蓝或者亮蓝（即“北京蓝”）最为时髦。“企领民装”于1961年～1963年在广东地区比较时兴，“文革”期间它仍被用于日常着装。

“文革”时期大部分人潮流穿的大概有几种啦：一种是“中山装”、一种是“直领文装”、一种是“解放装”，都是潮流兴起啊，我当时也追两种着装，就是“直领文装”和军装。“直领文装”就类似军装，但领子不是反出来的，就是好像“中山装”那样的直领，就没有反领的。<sup>⑫</sup>

#### （三）“工人装”

1949年以后，产业工人的阶级地位得到提高，劳动最光荣，简朴是时尚，穿“工人装”成为一种荣耀。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的搭配曾深受青年女性的追捧。工装裤为背带式，胸前有一个口袋。<sup>⑬</sup>

“工人装”脱胎于工作服，后者主要是国家为一些国有大企业的职工提供的制服，根据访谈资料和当时广东工厂的性质，它主要分为准军事化的工作服和一般工作服两类：前者分铁路制服和造船厂工人制服两类；后者主要是毛巾厂、棉纺厂、食品厂、机械厂、制药厂等工人的制服。工人在工作时间全部都穿工作服，有工人在工余时间也选择工作服作为日常穿着，部分青年工人甚至在相亲等重要场合也自豪地穿上工作服，以彰显自己“主人翁”的地位。以当时的铁路制服为例，其色彩以蓝色为主，很少有改变。铁路制服的男装与女装略有不同：男装通常是圆领，没有翻领，与“中山装”有几分相似，通常有四五粒纽扣，胸前有衣袋；女装有领，但没有衣袋。男女铁路职工都统一佩戴“大圆帽”。男装的大圆帽有帽舌，女装的大圆帽没有帽舌。男女职工帽子的正前方都有一个铁路路徽，类似解放军的军徽。

“工人装”成为时尚装束的最主要原因是工人



穿“工人装”的女工（图片来源：《人民画报》1963年第10期）

阶级首屈一指的政治地位。“文革”中全民所有制工厂中的工人地位极高，“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本质上是与“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相辅相成的。1949年9月29日的《共同纲领》在第一条肯定了工人和农民的政治地位，即新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阶级，成为新政权的主要阶级基础。工人和农民（贫下中农）成为党和国家在城市和农村所依赖的主要政治力量。<sup>⑭</sup>在国家“唱高”工人阶级的大背景下，作为该阶级日常着装的“工人装”，自然成为继军装之后，全社会竞相追逐的一种时尚，并且对民众的审美取向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sup>⑮</sup>受访者认为“工人装”在当时属于时尚服装：

当时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穿一件工作服，那时工作服也成为时尚。在工作以外的生活，都会穿工作服，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政治形势形成的一种流行。因为当时除了解放军受到全国人民的尊重及学习外，工人阶级也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是一个很先进的阶级，工人的地位很高的。当时很多学校、一些重要的单位都有工宣队进驻的，由工人阶级去管理，所以工人的地位是很高的。<sup>⑯</sup>

“工人装”成为时尚也包含经济利益的考量，工人阶级乐于以此表达并彰显自身的革命趣味，而“灰色”和“黑色”群体也倾向于借用“工人装”来建构自身所缺乏的革命趣味。一方面，工人阶级从国家那里获得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和集体福利，比如在福利分房、公费医疗、教育、薪酬分配和组织提拔等方面，他们得到的实惠都是最多的；另一方面，他们能够将政治资源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利益。无论是学生的毕业分配，知青的上调回城，还是被推荐参军或者上大学，工人子弟比其他阶层子女有着更大的优势。

国家以“解放妇女”的名义完成了对女性的全面控制，“工人装”也成为革命女性的标志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工农大众和妇女的权利、权益和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然而，“社会主义革命的确在它可能的最大限度内解放了妇女。但它没有把妇女交还给妇女自己，而是交给了国家。准确地说，是国家通过‘解放妇女’完成了对妇女的全面控制。”<sup>⑰</sup>因此，在生产领域，“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像男性一样劳动和工作；在消费领域（如服装消费），女性穿与男性一样的衣服，至少是中性风格的“工人装”，尤其是工装裤，这被认为是独立自强的新女性的表现。这些着装试图向大众证明：国家业已将女性从男性附属品的悲惨地位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能够在各种岗位上独当一面的新女性。

#### （四）“列宁装”

“列宁装”为双排扣和西装开领（有的“列宁装”在腰部做了特别设计，可以系一根同色布带，以凸显女性的胸部曲线），双排各有三粒纽扣（也有四粒纽扣的），双侧衣襟下方均带一个暗袋，可以是平袋，也可以是斜袋。“列宁装”源自前苏联，是20世纪初前苏联及东欧男性日常的上衣款式，女性则多以裙装为主，因为革命领袖列宁钟爱它，所以被称为“列宁装”。



1960年4月,身穿“列宁装”的宋庆龄(中)与邓颖超(右)一起接见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左)(图片来源:维基百科网站)

爽英姿标准形象的最初范本。”<sup>⑨</sup>这类服装的颜色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灰、黑和蓝(当然,在一个主色系下有颜色深浅的区分,如:蓝色分天蓝、湖蓝和深蓝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列宁装”成为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共产党女干部的首选着装,<sup>⑩</sup>被视为“地位装”(status dress),表征其拥有的社会地位及其政治身份。

改良版的正式“中山装”中有一种“军干装”,是男式干部服的一种,而女式干部服就是“列宁装”,因此,它又被称作“女干装”。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衣袋:前者是明袋,后者是暗袋,类似于西装。“文革”时期,“列宁装”是最为时尚的女干部的日常着装。<sup>⑪</sup>“列宁装”按开领方式分为两种:一般为小领口,更为时髦的女性大多穿着大翻领、双排扣、斜插口袋的“列宁装”。<sup>⑫</sup>

“列宁装”成为时尚着装之一与“工人装”被女性所推崇的主要原因一样。它也是新女性的标志之一:首先,它符合当时社会倡导的革命与朴素的着装原则,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那时年轻女性的时髦打扮,能凸显女性整洁利落、朴素大方又英姿飒爽的形象;其次,它或多或少带有些许装饰性元素:双排纽扣、大翻领以及腰带的配饰,能够凸显女性身体线条的美感。

那时的潮流就是那样,大部分都是穿“中山装”、“工装”和“解放装”。除非是干部,如果是女干部就穿“红卫装”、“列宁装”。我们老百姓就只能穿唐装了。不过“文革”中有一段时间,老公在部队工作,也会发衣服给家属的,有种叫“列宁装”,蓝色的。我跟着老公在部队里的时候就穿“列宁装”,那些服装是部队统一发的。<sup>⑬</sup>

另外,一些喜欢追赶时尚的青年女性对“列宁装”情有独钟,认为这一服装最符合个人理想中的穿着打扮:

1940年“三八”妇女节,中国女子大学的学员身穿一色“列宁服”,腰扎皮带,表演集体舞蹈。这次演出轰动了延安:在无论男女穿着统一制服,灰蒙蒙一片模糊了男女性别的延安,女大学生仿照苏联服装式样,自己组织裁剪缝制出绝无仅有的校服——“列宁装”。大翻领,双排扣,腰身收束,将女性青春健美的身材特征巧妙地显露出来,再穿上绣缀着两只红绒线球的布草鞋,别出心裁,标致又时髦。<sup>⑭</sup>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装束,“配上一张饱满红润的面孔,质朴诚恳的颜容,健美结实的身材,就成了后来影响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女英雄飒

最想穿的就是那种“四页子齐”的(衣服的前身和后身,左侧和右侧由四片布裁成并缝起来),剪裁有凹袋的“列宁装”。我记得那时候的画报上有一些女劳模的照片,什么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君,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也都是穿着“列宁装”,十分精神。我当时很羡慕她们,希望自己也能穿这么漂亮的衣服。<sup>⑮</sup>

共产党执政初期,“列宁装”的流行集中体现了苏维埃时尚。1945年后“列宁装”开始在解放区流行,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彻底恶化,“列宁装”才逐渐退出时尚舞台。

### (五)“红卫装”

“红卫装”因红卫兵而得名,红卫兵的全副行头是:长袖军装、长裤、军帽、帆布腰带、红袖章、军球鞋、帆布包、“小红书”。“红卫装”源于北京,在广东被称为“青年装”,是当时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年轻人的主要装束之一。

杨瑞是最早一批“红卫兵”,当年她16岁,是北京108中学的一名学生。“文革”初期,她和她的同学们骑自行车到北京各大中学校看大字报,参加群众集会。1966年6月下旬,当他们从清华附中听说了“红卫兵”这个新称呼后,十分神往,她回忆说: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的自行车越骑越慢,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新概念。后来我们干脆把自行车停在一条小河边,当时我们三下五除二就把红领巾巾撕开,把撕出来的红布条缠在左臂上,像20年代的工人纠察队一样。这样我们就算造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工作组的反。打这一刻起,我们不经任何人批准就把自己变成了红卫兵。<sup>⑯</sup>

杨瑞提到的这种特殊而新奇的打扮就是“红卫装”,红卫兵的精神似乎脱胎于这种着装本身:

街上行人很快注意到了我们的新装束:父母穿过的褪了色的旧军装、红袖章、帆布军皮带、绿军帽,女孩也像男孩一样把帽舌压得低低的……我们的眸子闪亮、目光清澈、脸颊红润。每人都骑着一辆锃亮的新车,飞驰而过,军装、袖章被风吹得嘤嘤作响。<sup>⑰</sup>

事实上,“红卫装”在广东的流行与北京来串联的红卫兵相关。杨瑞于当年9月初来到广州,她惊讶地发现广东的革命形势并不好,她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

从我们调查得来的结果看,广东省的气氛很不对劲。所到之处,听不见“文革”的呐喊,嗅不着战场的火药味儿。盘旋在



小领“列宁装”(图片来源:新华网)



街头巷尾的是软绵绵的粤剧清唱和广东音乐,街市熙熙攘攘,吃的、喝的、聊天的、买东西的,什么人都有。不少私营店铺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资本主义在这儿大行其道。<sup>⑤7</sup>

当地(广东)居民带着同情的惊讶打量我们的装束。汗珠从我们额头上大滴往外渗,衣裳全湿了,但我们还是不穿裙子、衬衣和凉鞋。任何使女孩显出女孩风韵的打扮都是资产阶级的。我们把自己严严实实包起来,我常常忘了自己的性别。<sup>⑤8</sup>

由此判断,“文革”初期,“红卫装”这种新兴时尚有可能带给广东民众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和革命震撼;同时,这种新时尚在南粤的发展与北京相比,有一个明显的时间差。此外,“红卫装”的流行,还跟这种服装的款式和比较多样化的色彩有一定关系:

因为当时的衣服无论是款式还是颜色都比较正统、比较正规,而“红卫装”分男女的,男的就好像跟军装差不多,但颜色就比军装多;女的就是外套,翻领,然后也比较修身,不那么宽袍大袖,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看的。<sup>⑤9</sup>

除了革命热诚和政治高压,是否选择追随时尚还与人们的经济状况相关。在当时,贫困通常是阻碍人们尝试新式着装的主要因素。

“红卫装”在当时算是很流行、好高级的服装,好好的服装,算是出得场的服装,我们去农村下地工作的时候是不会穿这么漂亮的衣服的,因为都不是很多人有,其实大部分人穿很旧的衣服,旧时的款式,也就是过时的服装比较多,就不会说特意在农村就做些“红卫装”或其他去参加劳动的,是没有的,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达不到这样的水平,没有可能让你这么丰富,不像今天那么多姿多彩。<sup>⑥0</sup>

事实上,着装时尚的变迁是一个波浪式渐进和消褪的过程,很难说清“红卫装”时尚的发端与消失的具体时刻,但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红卫装”的流行与红卫兵文化的兴衰关系密切,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红卫兵作为一个阶层,在阶级斗争中经历了话语权由获得到丧失的过程;第二是红卫兵自身的认同发生了转变。

“文革”刚开始的三年,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推进,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造反派组织的群众运动高涨。毛泽东八次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为其“赋权”,因此,“红卫装”成为一种“穿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着装实践。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集了红卫兵五大领袖参加座谈会,工宣队进驻学校,从清华附中发端的红卫兵运动宣告终结于清华大学。不久,北京的这些红卫兵及其领袖都被分配到了基层,同年开始了被称之为“‘文革’中最深入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之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动员。<sup>⑥1</sup>“1968年或1969年红卫兵的装束曾经站在时尚的最前沿,但四五年之后,当这些插队的青年人再次回到城



20世纪70年代初广东高州插队加入生产建设兵团九师的知识青年的“红卫装”(图片来源:中山大学图书馆数据库)

里,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落在了时尚潮流的后面。”<sup>⑥2</sup>

红卫兵一代认同的形成,是其在“文革”前所受到的革命传统教育、接班人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这三种革命教育的结果。话语狂欢、个人经历以及政治形势的突变构成红卫兵一代认同转变的动因,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的时期也正是红卫兵认同转变的开始。他们曾经对于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和领袖人物有强烈的认同,愿意为捍卫这些认同对象而“自我牺牲,抹杀自我,使自我的意识与利益服从于政治集体的意识与利益”,之后

出现“认同的危机,具体表现在对原认同对象的怀疑和内心的困惑。由怀疑、困惑到思考,到各种形式的反叛和对新的认同对象的表达,”<sup>⑥3</sup>“林彪事件”帮助他们最终破除了早先的政治迷信,同时“无情地击破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的神话,成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sup>⑥4</sup>而“红卫装”的兴衰是红卫兵一代认同转变的标志,认同发生转变,着装时尚也随之消逝。“红卫装”的流行时间仅有三四年,是“文革”期间最为“短命”的时尚。

总之,“文革”时期着装时尚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国家和政治权力对它影响重大。非市场化条件下,面对总体主义国家在私人生活领域的整合和规训,个体的应对策略包括顺从和超越两种。事实上,广东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稀释民众日常着装的政治化浓度,并由此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征,使其有别于其他省市。具体来说,20世纪70年代着装的个性化初露端倪。“林彪事件”后,着装出现多样化,服装式样的匮乏与单调催生了“复调”的着装时尚。服装的衣领、腰身、裤脚、裤线等,成为民众展示“暗藏的意愿”的广阔空间。追求细节美,构成对主旋律的一种日常着装反抗。

#### 四、总体主义背景下时尚的产生与传播机制

“文革”时期人们的着装必须遵照清晰而不可违背的政治规则,其中,最核心的一条是着装要符合个人的阶级身份。以下将从时尚的生产和消费两个角度总结、呈现在非市场化条件下,“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着装时尚研究的新发现,并与市场化条件下的西方着装时尚理论进行对话。

##### (一)“模仿—固守”胜于“模仿—创新”

从时尚的传播和变迁来看,“阶级分野论”强调“模仿—创新”是时尚传播和变迁的

动力机制。但是,从“文革”时期人们着装时尚的变化看,不同阶级之间的模仿与反模仿、区分与反区分的斗争并不是推动时尚传播与变迁的重要因素。首先,国家及其主流意识形态是着装时尚变迁的核心推动力,政治领袖和政治事件对着装时尚的传播和变迁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选择身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全国的红卫兵代表,引发了社会大众顶礼膜拜式的模仿,这是军装热潮的政治性肇始;反之,“林彪事件”之后,人们对军装的崇拜逐渐降温。

其次,被模仿的阶级乐于被社会许可的其他阶级模仿,被模仿者不会因为模仿者的模仿转而发明与创造出另一种着装时尚,而是采取了一种“模仿—固守”的策略。因为被模仿者的着装代表着国家“首肯”的着装秩序,模仿与被模仿本身是这种着装制度再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出身“灰五类”和“黑五类”的个体选择“红五类”的着装作为自身阶级属性和革命趣味的建构工具。面对这些模仿,被模仿者并没有用反模仿将自身与模仿者区分开来。相反,军人穿军装、工人穿“工作服”、干部穿“中山装”,这种着装选择是他们阶级属性和革命趣味的直接表达。

着装是一种结果,也是一个过程,更是一种“表征”,<sup>⑤</sup>通过着装,一种文化的众多成员运用着装生产意义。华尔德(Walder)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工业权力结构的研究表明:在政治化的奖惩制度下,日常生活迫使人们去形成一套有意识的、经过算计的“自我表现方式。”<sup>⑥</sup>它可以下意识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社会交往和互动中。在中国,这种个体革命性的表现方式是有意识的、持续的、受到鼓励并得到领导上认真评价的。<sup>⑦</sup>

总之,“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具有强烈的军队化色彩,军人、工人和干部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在声望体系中属于上层。军装代表着作为国家的钢铁长城、社会稳定和发展柱石的军队的光辉形象;“工作服”体现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生力军的工人“老大哥”的劳动形象;“中山装”是各级干部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时的制度性道具。他们不会因为其他社会群体的模仿而放弃自身的着装时尚,而是以一种固守的态度保持这种时尚,这是非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传播和变迁机制与市场化条件下最大的区别之一。

## (二)“补偿机制”让位于“淹没机制”

时尚对于“文革”时期的女性而言,不是“补偿机制”,而是一种“淹没机制”。如同一片海洋,革命时尚淹没了女性表现自我、追求个性的需求。访谈案例表明“文革”期间,两性在着装上差异不大,女性的性别特征和个性追求都淹没在男性化的着装体系中。在国家自上而下、强大又统一的道德宣教下,凡是与女性的第二性征相关的物品都是一种禁忌,令普通个体羞于启齿,并尽量试图逃避。国家希望女性尽量祛除其特有的“女人味”,变成与男性并无二致的女性劳动力。女性,首先是作为一种劳动力的形象出现在现实生活世界中,而绝对不是男性思慕和求偶的对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的政治宣传制造了大量“撑起半边天”的妇女形象,强调妇女能够承担跟男性一样的工作。这种宣传忽视了性别差异,女性按照男性的标准进入

工作场所等公共领域,与其说是男女平等,不如说是女性身体的男性化。<sup>⑧</sup>如果具有特性的女性身体还存在的话,那就是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存在于家庭内。虽然那个时代的“家”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国家权力渗透,女性的家务劳动也被视为对国家的责任。<sup>⑨</sup>本研究认为“文革”时期着装上的性别差异基本不存在。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之下,一方面,女性的某些天然性别特征受到了规制,比如胸部和头发。<sup>⑩</sup>畸形的性别文化和扭曲的性别秩序令民众对“美”和“女人味”等字眼退避三舍,美被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另一方面,女性自我意识被内敛化与封存,国家有意淡化性别意识,甚至直接去性别化,导致性别淹没,女性的性别意识被迫淹没在革命激情和工作(或劳动)激情中。对于当时的女性而言,如果她们所穿的服装不符合当时的着装规范,社会自然将着装与其思想意识和道德水准直接挂钩,并对其进行社会制裁。

## (三)“社会认同”凌驾于“自我认同”<sup>⑪</sup>

从消费者的心理看,着装时尚具有认同功能。认同可以分为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前者指通过着装把自己归于某一类型的人;后者则是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表现个性和特殊性。“身份认同论”强调消费者通过着装时尚展现个性,建构自我认同。而本研究发现在一个以抑制型集体意识占主导的年代,人们的个性和特殊性受到压制,更多是强调共性和与他人的一致性,因而,从认同功能看,社会认同被凸显,自我认同受抑制。表现在着装上,是千人一面,款式单调,害怕与社会主导的服装款式存在差异。个体通过采纳具有政治合法性的着装时尚而寻求安全感。当时一些有海外关系,或曾在国外工作过的大学教师,出于政治考虑,放弃了崭新的西装和显眼的“中山装”,选择了“工作服”作为自己的结婚礼服;<sup>⑫</sup>“黑五类”的子女穿上军装,“变成”了解放军,心情激动;<sup>⑬</sup>“红色外教”也穿上绿军装<sup>⑭</sup>等案例都表明个体以共性的追求掩盖个性的展示,抑制着装上的自我认同,最大限度地追求着装上的社会认同,并由此获得安全感。

## (四)“共性”主导“个性”

从生产层面看,布鲁默(Blumer)的“集体选择论”把时尚的形成看作是基于集体品味而做出集体选择的结果,集体品味的变化导致了时尚的变迁。在他的时尚理论中,品味、集体品味是核心概念。他认为品味与个体的经验有关,形成于互动过程中;品味一旦形成,也会衰落和重构;品味是个体选择的依据、行为的驱动器和引导者。然而,本研究认为:“文革”期间,个人处于社会的总体主义笼罩中,个人被弱化,缺乏个性,很大程度上只是类型化的存在。个体的品味并不完全是个体进行着装选择的依据,也不完全是他们着装行为的驱动器,更不完全是他们着装实践的引导者。多数被访者强调自己当时的着装完全是随大流,出格和另类等可以展现个体品味的着装是他们极力避免的。“红色外教”模仿红卫兵穿上绿军装等案例都表明个体以共性的追求掩盖个性的展示,共性主导个性,共性化的着装不仅是政治保护伞,而且使个体获得安全感。

## (五)“无选择的选择”替代“自由选择”

“集体选择论”认为集体品味是在某个领域中进行互动并拥有相似经验的人之间形



成的,时尚历经了一个从众多竞争性服装款式中进行自由选择的过程;服装设计师试图表达出某种现代性倾向;采购商通过购买,最终确立某种时尚。“文革”时尚的形成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自由选择的过程。当时并不存在众多竞争性的服装款式和颜色,甚至布料上的某些图案也经常被指责为具有资产阶级情调而被迫取消,禁止生产。单一化着装时尚的出现是个体无可选择的直接结果。当时社会上关于“奇装异服”的大辩论证明了服装设计师在日常工作中贯彻了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中有关个体着装秩序的内容。布鲁默认为时尚存在必须具备几个条件,其中包括时尚领域必须对新出现的社会形式持开放态度;在诸多可相互替代的模式之间做选择时,个体必须有相当的自由度;时尚领域能够对外部事件的影响、新行动者的加入和内部互动方式的变化这三种情况持开放态度。笔者对“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的研究表明:西方市场化条件下的着装时尚领域所谓的“自由度”和“开放态度”等在“文革”时期根本不存在。<sup>⑤</sup>

#### (六)“文化中介人”即国家

“文革”期间,国家及其政治意识形态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着装实践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国家是个体着装合法性的立法者和阐释者,并通过相应的媒介和舆论工具将着装信息传达给社会大众。媒体、记者的报道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缺乏自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因而,媒体及记者背后的国家及其相应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着装时尚价值的立法者。军装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服装,而且也是一种最具有“革命用途”和“革命作用”的政治合法性物品。它的社会属性远远超越于作为一种普通消费品的自然属性,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通人完全按照社会政治权力关系赋予这种消费品社会意义以区分它、对待它并使用它。这种特殊物品的社会意义背后隐含的是一种政治符号价值体系,与这种符号价值体系相对应的是一套由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决定的、特殊的社会价值规范系统及其背后的社会道德秩序。

如上所述,“文革”时期个体的着装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符号价值,它在特殊的社会情境中起到了地位符号的作用,它能够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成员区分开来。与西方着装时尚理论不同的是:凡勃伦(Veblen)认为着装体现了不同社会地位的成员在金钱支付能力上的差异;而在布迪厄(Bourdieu)看来,着装体现的是不同社会地位的成员在品味、文化资本上的差异;而在本研究中,着装体现的是国家赋予个体着装政治合法性上的差异,是着装者在社会给定的政治坐标中所拥有的政治资本的差异,军人、工人和干部等在社会声望体系中居于较高的地位,他们的着装自然成为大部分社会成员模仿的对象。社会大众对他们着装的模仿是当时消费政治、消费制度和消费意识形态作用于个体着装实践的必然结果。

## 五、结论

总体主义背景下的时尚是一种独特的时尚,它是自上而下树立的时尚,与政权的合

法性资源紧密相关,工农、军队、国家干部、红卫兵的日常着装结构性地成为具有合法性的时尚着装,这是“文革”时尚的结构性特征。“文革”时期日常生活的高度政治化导致了身份认同的危机,符合合法性的着装时尚具有政治认同功能与政治保护伞功能,为自我瞬间的整合提供了可能性,这是“文革”时尚的建构性特质。这种时尚的产生与传播是国家与民众双向互动的结果。

“文革”时尚是一朵病态的奇葩,它力图借助特殊的着装制度将普通民众的思想彻底革命化。它刻意回避除了政治光荣与政治梦想之外,普通民众还有平凡而琐碎的日常生活这一客观现实。它鼓吹极端的个人崇拜和政治忠诚,对国家和领袖顶礼膜拜。在着装领域,民众不过是一些矮化的个体,是没有个性的群氓,是摒弃了私人利益,祛除了个人情感与立场的革命工具。政治化的着装掩饰了国家和民众的苦难,人为地制造了社会的区隔与仇恨,着装是否具有政治合法性成为个人政治身份非红即黑的政治标签。因此,政治化的着装也成为“文革”灾难的一种助推器。

“文革”时期政治化的着装本身有时代的土壤环境,它与狂热革命年代的红色标语、红色口号等连为一体,构成一套具有历史印迹和时代特征的红色话语。这种时尚的精神基调是革命与造反,哲学基础是斗争哲学,价值内涵是阶级斗争,它们构成了“文革”的精神叙事,这也正是“文革”时尚的政治意涵。

在这种革命叙事的背后,可以窥见非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独特的产生与传播逻辑,即时尚的中国式产生与传播机制。与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不同,总体主义背景下的时尚遵从权力和资源的垄断逻辑,其产生与传播的背景包括列宁式政党、军队和国家政权,这三者构成威权的权力架构,此外,总体主义的社会控制系统、密不透风的国家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三者共同构筑了总体性社会的时尚文化。

\*感谢王宁教授、Deborah Davis教授、杨国斌教授和徐建华博士对本文提出的批评与建议,文责自负。

注释:

①Simmel G.,“Fash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 No. 21, 1957, pp. 480-498; King, Charles W.,“Fashion Adoption: A Rebuttal to the ‘Trickle Down’ Theory,” in Stephen A., Greyser (eds.), *Toward Scientific Marketing*, Chicago: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1963, pp. 108-125; Field, George A.,“The Status Float Phenomenon: The upward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Business Horizons*, 1970, pp. 45-52; Steele, Valerie,“Fashion,” in Steele V.(ed.), *Encyclopedia of Clothing and Fashion*, Farmington Hill, MI: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5, pp. 12-13; Blumberg, Paul,“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Status Symbol: Some Thoughts on Status in a Post-industrial Society,” *Social Problem*, Vol. 21, No. 4, 1974, pp. 480-498;[美]坎贝尔:《求新的渴望》,载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

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页。

②[美]齐美尔：《时尚的哲学》，载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第252～253页。

③参见Davis, Fred, “Fash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Wilson, Elizabeth, *Adorned in Dreams: Fashion and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④Bourdieu, P., “Haute couture et haute culture,” in Bourdieu, P.(ed.), *Questions de sociologie*, Paris: Minuit, 1984, pp. 196–206.

⑤Blumer, Herbert, “Fashion: from class differentiation to collective selection,”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10, 1969, pp. 283–287.

⑥郭于华：《克服社会恐惧症》，载《社会学家茶座》2011年第2辑。

⑦图1在王宁提出的“中国消费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基础上，针对“文革”时期的特殊情况有所修正。

⑧有关国家的研究，可参照国内外学者Schwartz, 1968; Tilly, 1978; Skocpol, 1979; Tsou, 1986; Walder, 1986; Shue, 1988; Wank, 1998; 萧功秦, 2002; 张静, 1998等的著述。

⑨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⑩Denzin, Norman K., “The Comparative Life History,” in Denzin (ed.), *The Research Act*,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8, pp. 214–255.

⑪Bernstein, Thomas P.,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转引自周雪光、侯立仁：《文革的孩子们——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生命历程》，毕向阳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6页。

⑫按照恩特维斯特尔(Entwistle)的观点，狭义时尚特指特殊的衣着系统。参见[美]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郜元宝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郑也夫将时下流行的风尚定义为广义的时尚，或者说是特定时期流行的着装和行为方式，参见郑也夫：《论时尚》，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2期。

⑬有关服装色彩和服装面料/质地这两个维度的大量实证资料生动而有趣，但囿于篇幅，笔者将在其他文章中呈现这些方面的研究。因为按照当时的实际状况，服装的款式与本文着重探讨的着装者的阶级出身、政治面貌和职业的关系最为紧密；而服装面料最能体现其家庭的经济状况，从一个侧面也能体现着装者的家庭成员，主要指其父母所从事的职业。在某些情况下，服装的色彩是着装者表达顺从或者超越的感性道具。

⑭安东蒿(Finnane)分析“文革”时期中国大陆的时尚时将着重点放在军装、“红卫装”、“干部服”和“江青裙”上。事实上，就广东地区而言，情况有所不同：首先，“干部服”分男女两类，男式“干部服”又分四种，女式“干部服”分两种；其次，无论从文献还是实证资料上来看，“江青裙”在广东不曾流行。参见Antonia Finnane, *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 Fashion, Nation,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27–255。

⑮北京市政府新闻处：《京津卫戍司令部严令市民等勿穿军服》，载《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5日。

⑯北京市政府新闻处：《非军人不得穿军服 京津卫戍区司令部说明军服式样颜色》，载《人民日报》

1949年11月24日。

⑰于兴卫：《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缘起》，载《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5期。

⑱《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

⑲逢先知、金冲及(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4页。

⑳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197页。

㉑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版，第802页。

㉒笔者于2005年9月8日在广州对S5–CXQ的访谈笔录。

㉓[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5卷，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

㉔同注⑨，第18页。

㉕笔者于2005年8月23日在广州对S4–LXS的访谈笔录。

㉖笔者于2005年5月3日在广州对S2–HGX的访谈笔录。

㉗郑红娥：《社会转型与消费革命——中国城市消费观念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4页。

㉘正值“文革”拉开序幕的1966年6月，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有所思》：“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这是毛泽东公开发表的唯一一首有关“文革”题材的诗词，生前曾反复修改并审定，可见其本人对此诗的重视。此诗的基调是歌颂“文革”。参见梅振才：《文革诗词见证历史》，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版，第636～637页。

㉙同上。

㉚孙沛东：《裤脚上的阶级斗争——“文革”时期广东的“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

㉛笔者于2005年8月19日在广州对S3–CHT的访谈笔录。

㉜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8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㉝“毛装”(Mao suit)是西方对毛泽东所穿服装及仿毛服装的总称。

㉞参见《广州市志》，广州市地方志网站，<http://www.gzsdfz.org.cn/dqzlk/gzsz/>。

㉟同上。

㊱同注⑭，第183页。

㊲笔者于2006年10月5日在广州对S45–LWZ的访谈笔录。

㊳这里专指男式“干部服”，因为女式“干部服”是“列宁装”。

㊴笔者于2006年10月27日在广州对S50–CHJ的访谈笔录。

㊵笔者于2005年9月8日在广州对S5–CXQ的访谈笔录。



④①笔者于2005年9月15日在广州对S9-HJF的访谈笔录。

④②笔者于2006年8月10日在广州对S23-BM的访谈笔录。

④③“工人装”同时搭配的,一般是圆顶有前檐的工作帽和胶底布鞋,布鞋多为手工制作。前后挂胶,以草绿色帆布为面、橡胶为底的“胶鞋”,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穿这种鞋而得名“解放鞋”,它成为这一时期城乡广为使用和喜欢的鞋型。

④④同注⑨,第77页。

④⑤“文革”中对人的尊称是“师傅”,这个原来在工厂内对有一定资历工人的尊称,随着工宣队进驻各领域而流行,一度代替了“同志”,为显示革命性,报纸也争相使用工人的日常语言。此外,在老百姓中,和工人结婚是婚嫁的首选。参见李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及工人阶级的地位》,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第181页。

④⑥笔者于2006年4月13日在广州对S14-FJW的访谈笔录。

④⑦李小江:《“男女平等”:在中国社会实践中的失与得》,载《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1期。

④⑧徐岚:《女大的劳动生活》,载阎明诗:《延水情: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笔者认为20世纪初,为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共产国际派来马林、李德等外国革命者进入敌后根据地工作和生活,同时引入前苏联及东欧的一些着装习惯和服装款式。当时,共产国际掌握着中国革命的主导权,这大概是“列宁装”开始在延安时期就成为时尚的原因。

④⑨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页。

④⑩新中国成立初期,宋庆龄作为国家副主席,接见外宾或者出访国外时,通常穿着旗袍。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访时也是身穿旗袍。王光美身穿旗袍,胸前悬挂着一长串乒乓球做的“珍珠项链”被清华附中红卫兵批斗的场景是“文革”时期“着装反革命”的一个记录。

④⑪在访谈资料中,极少数女性被访者提到自己的单位当时也曾流行穿“红卫装”,可以肯定的是:“列宁装”老少咸宜,“红卫装”似乎更适合年轻女性干部。

④⑫参见葛万青、张春宁:《服装:一去不返的列宁装》,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w/2006-03-20/12578483737s.shtml。

④⑬笔者于2006年10月29日在广州对S53-ZLK的访谈笔录。

④⑭笔者于2006年4月13日在广州对S15-LXL的访谈笔录。

④⑮杨瑞:《吃蜘蛛的人——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转引自新浪爱问·共享资料网站,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2485759.html?from=like,2011年6月10日访问。

④⑯同上。

④⑰同上。

④⑱同上。

④⑲笔者于2005年8月19日在广州对S3-CHT的访谈笔录。

④⑳同注⑳。

④㉑同注㉑。

④㉒同注㉒,第245页。

④㉓杨国斌:《红卫兵一代的认同转变》,载宋永毅(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第319~326页。

④㉔同注㉔,第62页。

④㉕[美]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1页。

④㉖[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

④㉗同上。

④㉘参见Croll, Elisabeth, *Chang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 Women: Rhetoric, Experience, and Self-percep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Wolf, Margery, *Revolution Postponed: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④㉙参见Evans, Harriet, “Past, Perfect or Imperfect: Changing Images of the Ideal Wife,” in S. Brownell and J. N. Wasserstrom(eds.), *Chinese Femininities, Chinese Masculinities: A Rea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④㉚被访者S60-LPL曾对笔者谈及,当时有些女知青用白布自制文胸,达到与男性一样的平胸效果,才会觉得内心自在和踏实。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女性的发型还比较多样化。“文革”前期,社会鼓励中性化的装束,女性的长发或辫子也被要求剪短,甚至被红卫兵或者农村里的村干部强行剪短,齐耳短发代表着昂扬的革命激情和饱满的革命干劲。

④㉛这里强调“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区分似乎有过度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之嫌,笔者同意“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二者不一定对立,可以同时兼备,但是在“文革”时期,“社会认同”被凸显,“自我认同”受抑制,对个人着装影响更大的是“社会认同”,这也是笔者强调国家在时尚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

④㉜笔者于2006年10月6日在广州对S46-LQL的访谈笔录。

④㉝笔者于2005年5月1日在广州对S1-HFH的访谈笔录。

④㉞同注㉞。

④㉟同注㉟。

孙沛东: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黄柏莉